

近代 社会主义的先驱

第一卷

〔德〕卡尔·考茨基著

商务印书馆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第 一 卷

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

〔德〕卡尔·考茨基 著

韦建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9年·北京

Karl Kautsky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Erster Band
Kommunistische Bewegungen
im Mittelalter
1976 bei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 Gmbh
Berlin · Bonn

根据迪茨出版社1976年柏林版译出

Jīn dài shè huì zhǔ yì de xiān qū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全 四 卷

第一卷 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

〔德〕卡尔·考茨基 著

韦建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ISBN 7-100-00462-4/D·25

1989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10 千

印数 1,900 册 印张 12 1/8

定价：4.30元

译者序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是一部阐述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探讨社会主义思想渊源的著作。全书共分四卷。

第一、二卷由卡尔·考茨基执笔,论述了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潮。其中第一卷着重分析了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历史原因和经济基础,概述了各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共同特征,介绍了这一时期出现的形形色色具有空想共产主义倾向的异端教派,如韦尔多派、使徒兄弟会、伯格德派、罗拉德派、塔博尔派和波希米亚兄弟会等组织,并剖析了与这些派别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历次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意大利的多里奇诺起义、英国1381年的农民战争、威克里夫运动和波希米亚的胡斯运动。在第二卷中,作者集中阐述了德国农民和市民阶层在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产生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描述了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斗争业绩和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详细评述了再洗礼派的纲领以及他们在明斯特坚持斗争的历史。

第三卷是考茨基和保尔·拉法格著述的合集。在这一卷中,考茨基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生平、著作和实践活动,拉法格评述了意大利空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托马斯·康帕内拉的理论思想和政治生涯,并研讨了十七、十八世纪在南美巴拉圭出现的“耶稣会国家”的历史,介绍了耶稣会教士当时在那里试行的种种具有空想共产主义色彩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论述了这个组织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最终面临的历

史命运。

第四卷的作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胡果·林德曼和美国社会党人莫里斯·希尔奎特。书中论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揭示了这些思潮和运动的深刻社会背景，并详细地介绍了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北美进行实验的情况，生动地记述了各种共产主义移民区开展活动的史实。

这部著作的各卷相继完成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1895年，考茨基、伯恩斯坦、拉法格、梅林和狄茨等人计划在斯图加特以多卷本形式出版一部《社会主义史综述》，并决定将整部著作分成若干独立的专题，既叙述近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史实，又钩深致远、探赜索隐，追溯社会主义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渊源。由于条件限制，这项工程未能完竣。《社会主义史综述》一书最后只出了两卷，即第一卷《近代社会主义先驱总论》和第三卷《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梅林著）。第一卷由两个部份组成，其中第一部份是考茨基的论著，题为《从柏拉图到再洗礼派》；第二部份汇编了考茨基、拉法格和林德曼等人的著述以及伯恩斯坦写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文。《社会主义史综述》的出版计划中辍以后，考茨基等人决定将原书第一卷作为独立著作刊行于世。他们抽出了伯恩斯坦的文章，于1908年将这一篇幅较长的著述作为单行本出版，而将考茨基、拉法格、林德曼等人的论著按前述顺序编成四卷，重新印行，并将原书标题改作《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四卷集版本的由来。

从这部著作问世时算起，迄今已经有八十余年了。在此期间，社会主义史研究领域出版了许多新著，并且发掘和整理了不少新的史料。可是今天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我们仍然会深受启迪。这部书的编者和作者大都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直接影响下从事过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尽管他们后来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在当时，他们毕竟是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社会主义史的学者。他们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去摧毁廓清这个领域长期流行的唯心主义陈腐观念，以明白晓畅而又雄辩有力的笔触论述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他们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鉴古论今，展望未来，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勃勃的生气和逻辑的力量。这部著作属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史研究领域培育的最初一批果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部著作本身也在社会主义史上留下了值得重视的一页。尽管它在许多方面还显得不够成熟，但它毕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和社会主义学说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考茨基和拉法格等人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这部著作值得重视之处还在于它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而在这方面，又以考茨基撰写的第一、二卷最为突出。列宁曾指出：“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善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①《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第一、二卷堪称这样的“财富”。考茨基为了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穷源溯流的探究，把目光从近代移向遥远的古代。他考察了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政治思想，考察了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本质，考察了中世纪不断涌现的各种具有空想共产主义性质的异端教派，考察了历次农民起义的纲领与斗争实践，特别是详尽地评析了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力图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上追寻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留下的踪迹。他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在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宗教乃至科技和文艺著作中广搜博采，披沙汰金，钩稽史料，并依据各种方志、稗史、文书、契约、法令、年鉴、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49页。

谣谚、章程、书简、传单以及宗教典籍来考辨史实。他深知任何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的根源都深藏在经济事实之中，因此他始终着力于研讨各个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用经济领域的变化来说明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他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史料进行综合和分析，以便勾勒出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以前发展的轮廓。

应当说，考茨基的工作还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无论在史实考订方面，还是在理论阐述方面，这两卷著作都存在不足之处。可是，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对考茨基的研究成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95年3月25日，他写信给考茨基，说他正在“急切地等待这本著作”；^①4月初，他致函拉法格，说他“收到了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运动史》”；^②5月下旬，他已经读完全书，并在致考茨基的复信中仔细地分析了这本著作的得失。他指出书中的两个不足之处，一是“对于完全处在封建的等级划分之外、失去了阶级特点、几乎被置于最低阶层的地位的那些分子的发展和作用研究得很不够”，二是“对于十五世纪末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和“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没有充分了解”。^③但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这部著作是充分肯定的，他以赞许的笔调写道：

“关于你的书，我可以这样说，越到后面越好。从原计划看，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探讨得还非常不够。关于中世纪的那些教派就已经好得多了，而且越往后越好。最好的是塔博尔派、闵采尔、再洗礼派。对许多政治事件作了重要的经济论证，但是也还有一些泛论，说明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我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很多东西，这是我修改《农民战争》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26页。

② 同上，第434页。

③ 同上，第461—462页。

④ 同上。

恩格斯以前常常批评考茨基是“学理主义者”，指出他的不幸就在于“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①，然而这一次，恩格斯却对考茨基的著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之所以十分推重这部著作，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两卷新书资料翔实、考证精当，为他修改《德国农民战争》提供了新的史料。恩格斯在1895年3月25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急切地等待这本著作不仅仅是由于再洗礼派的缘故”，而且也由于“以前的运动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说明”^②。考茨基的著作正是对“以前的运动”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并对那些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及时地拓展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项工作无论对于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是对于推动现实的斗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恩格斯赞同考茨基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认为考茨基“抓住了一个全新的题目”^③。他称考茨基的著作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前史”^④，认为“研究这样的问题，从来不会一开始就完全成功的”，因此，他鼓励考茨基“一定不要把已经动手的工作丢开，而应该继续研究下去”^⑤。恩格斯自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缜密的思考。在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月内，他仍然对这项研究工作倾注了心血，并十分渴望在修改《德国农民战争》时详尽地阐述自己的见解；他怀着满腔的热忱写道：“但愿我能做到这一点！”^⑥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恩格斯晚年对研究“社会主义的前史”如此关注和重视，这是发人深省的。研究这个“全新的题目”，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学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前途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时，这种研究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11、446页。

②④ 同上，第39卷，第426页。

③⑤⑥ 同上，第462页。

有利于我们去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摒除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义出现的种种唯心主义空想模式和错误论断。当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研究这样的问题是很艰巨的工作。我认为，这个题目要求研究者具有纵观世界的眼光，不仅要面向欧美国家的历史，而且也应当面向东方民族的历史；不仅要做钩沉辑佚、拾遗补阙的考证性工作，而且要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把“社会主义的前史”同整部社会主义运动史、特别是同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可惜多年来，恩格斯的遗愿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这个译本能对这方面的工作有所促进，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译完这部欧洲的“社会主义前史”，我自然想到了中国。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有它的“前史”吗？回答是肯定的。从先秦哲人提出“兼爱”、“尚同”，到《礼运》篇描绘“大同”世界；从封建前期农民起义者提出“太平”世界的空想，到中世纪“异端”思想家设计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从早期启蒙者黄宗羲、颜元、李塉、何心隐、龚自珍等人憧憬未来的“理想社会”，到太平天国领袖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构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史”可以说是赓续不绝，源远流长。在今人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历史传统的积淀势必顽强地发挥作用，从而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这已经为实践所证实。“前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能不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的著述呢？

我们期待着。

韦建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卡尔·考茨基
-------------	--------

第一篇 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共产主义的基础

第一章 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和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	12
一 柏拉图和他的时代	12
二 《国家篇》	21
三 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产生的根源	32
四 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本质	39
五 中世纪教会的财产	54
六 奴隶制的消亡	60
第二章 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雇佣劳动者	68
一 早期的手工业	68
二 行会	72
三 早期的帮工制度	75
四 学徒，帮工，师傅	81
五 帮工与师傅的斗争	89
六 帮工的社团组织	97
七 城市的工人贵族	110
八 马尔克公社和矿产开采权	114
九 大型的资本主义矿山企业	123
十 矿工	137
十一 纺织业中的资本与劳动	148

第二篇 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派别

第一章 中世纪共产主义的共同特征	164
一 寺院共产主义	164
二 异端教派的共产主义与教皇统治	187
三 中世纪的贫富对立	191
四 基督教传统的影响	194
五 神秘主义	199
六 苦行主义	207
七 国际性和革命精神	212
第二章 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异教共产主义	221
一 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	221
二 韦尔多派	226
三 使徒兄弟会	236
四 农民战争的经济根源	245
五 多里奇诺起义	252
第三章 伯格德派	260
一 伯格德派初创时期的状况	260
二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和教皇	271
三 查理四世统治下的天主教反动势力	279
第四章 英国的罗拉德派	283
一 威克里夫运动	283
二 罗拉德派	288
三 1381年的农民战争	294
第五章 塔博尔派	306
一 教会大分裂	306
二 胡斯战争爆发前的波希米亚社会状况	311
三 胡斯运动的开端	320

四 胡斯运动中的各派	325
五 塔博尔的共产主义者	330
六 塔博尔派的覆亡	345
第六章 波希米亚兄弟会	358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二版印行时，我们在形式上作了变动。这本书现在已经不再作为一套丛书的首卷出版，而是以独立著作的形式刊行于世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任何修改；就内容来说，本书基本上依然保持原貌。我只是对书名作了改动。这部著作原先题为《近代社会主义先驱总论》，现在改成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这一改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十分必要，因为本书第一版的题目与内容不尽相符。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当我确定了本书的主旨，开始执笔起草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决定把这本书编入社会主义通史，并作为这套丛书的首卷在日后出版。

早在《社会主义史综述》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拟定之前，我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编写本书，并且完成了其中的主要章节。将近 1/4 世纪以前，我就已经着手为撰写本书进行研究工作了。当时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把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也是恩格斯早在 1845 年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提出的要求。^① 1886 年，我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组题为《哲学的贫困和资本》的文章，对这

^①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份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27 页。）——译者注

一思想作了详细的阐述。那时候，欧文和魏特林等人所坚持的空想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明显。我很想了解这种矛盾的由来是否能上溯到过去的时代，同时也想探究这种矛盾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我感到，研究宗教改革时期的情况对于弄清上述问题十分有益，因为在那个时期，许多略具雏形、刚刚萌生的矛盾已经产生了影响；后来，由于专制主义的压迫，这些矛盾未能显现出来，直到17世纪中叶、18世纪末期以及19世纪，它们才分别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中重新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认为，在宗教改革时期，这种矛盾在托马斯·闵采尔和托马斯·莫尔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作出错误的判断，可是，我所设想的计划却与事实相距太远：当初我以为，只要用几个印张的篇幅就足以阐明这两个人物的特征及其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地位；而后来，我却很快就陷入了日益繁复的工作之中。

在研究托马斯·莫尔的过程中，我的工作进展得倒还十分顺利；1887年，我已经出版了有关这个人物的专题著作。^①莫尔在学术方面造诣深湛，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我们从这些著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本质特征。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莫尔享有崇高的声誉；那些作家经常饶有兴致地执笔为文，评述他的为人和作品。莫尔生前是一位政治家，临终时成了天主教会的一名殉道者。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常常怀着爱戴的心情描述他的政治生涯。况且，莫尔所参与的学术事业和政治活动都是在上层进行的，而社会的上层总是为公众所瞩目，因此我们也就比较容易掌握那个领域的情况。

可是，当我着手研究闵采尔的时候，却遇到了远为复杂的难

① 《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引论》，1888年斯图加特版。——译者注

题。闵采尔所接受的并不是人文主义教育，而是神学教育；他给后世留下的只是一些传单，而这些传单又裹着厚厚的一层神秘主义外衣，人们很难揭开这层外衣，以窥见其中的实质性内容。闵采尔的信徒和朋友大都是没有文化的无产者，而当时那些记述闵采尔生平活动的文献编纂家又都是同他势不两立的仇敌；而且，闵采尔所献身的运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之下，因此，有关他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的那些记载就不仅充满敌意，而且往往显得十分含混。

所以，我绝不能单纯以这些史料为依据；在参考史料的同时，我必须用更多的注意力去认识闵采尔参与的那场运动所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便用这种认识去阐明闵采尔的斗争历程。这种做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所遵循的唯物主义方法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种要求。

我在历史研究中遵循的这种方法常常遭到曲解，那些批评我的人总爱指责我随心所欲地“杜撰”历史，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我采用的这种方法作一番简要的论述。

历史的起点从来都是人类个体的历史。我们所说的社会，实际上只是人类个体相互关系的总和；个体之间的合作、互助或斗争乃是维持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个人的作用不再产生实际效果，历史的发展就会戛然而止。唯物史观之所以与传统历史观迥然不同，并不是由于唯物史观无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由于唯物史观绝不仅仅着眼于个别的杰出人物。在历史文献中，唯有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才得到流传，也只有他们才被看成是历史进程的体现者。而我们则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全体参与者共同创造的结果，单独的个人即便拥有无边的权力，也无法象全体群众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要想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就必须首先弄清促使群众投入运动的原因。

可是，给我们提供历史资料的那些文献编纂家却很少考虑到

群众。他们所推崇的是曾经对群众产生过特殊影响的个别人物。当然，在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们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也常常需要从研究杰出人物入手，为此，我们可以去研究莱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可以去研究大革命时期的人物或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可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个别人物的研究不过是整个研究工作的起点罢了。我们不能把群众看成是一连串毫无价值的“零”，以为只有在这些“零”前面加上一个数码才能使它们构成有效数字；我们也绝不打算从群众领袖的身上去领悟群众所起的作用。在促使群众投入运动并激励他们发挥作用的诸种因素中，领袖仅仅是一种因素，而这种因素并不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况且，领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并根据群众的意愿去确定目标，如果没有群众，领袖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人物了。

因此，如果我们需要描述和理解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就应当研究这个人物的各种特征，看其中有哪些成份属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该时代的人民所具有的社会共性，哪些成份属于这个人物本身所特有的个性。在确定了这一点以后，还要进一步研究这种个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对个人产生影响的特殊环境和特殊命运铸成的。在这一切全都弄清之后，这个人物身上剩下的那一部份稟性就只有用他本人的天赋条件来说明了。而面对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则应当停住自己的脚步。对于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来说，也许正是剩下的这一部份稟性包含着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却没有丝毫的意义。

在达到了上文列举的各项目标之后，我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直到这时，我们才开始接触到这一任务的最艰巨的部份，

当我们把需要研究的人物所具有的个性和他的社会性加以区分以后，我们还必须努力弄清这种社会性的内涵。这个人物以社会运动的代表和先驱的身份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因此，面对这

场社会运动，我们也同样需要努力区别其中的特殊因素和一般因素。为此，我们必须把这场运动同其他各种类似的运动加以比较，以便通过这一途径去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共同之处。

在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项最浩繁、最艰难的研究工作。我们必须把历次运动同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整个社会进程联系起来逐一加以考察，而整个社会的进程归根结底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探讨每一次运动的历史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当时的社会特征和经济特征加以解释，一方面又要研究历次运动的共同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那些因素。

只有在这种研究获得成功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能够把某个历史人物作为起点，进而去深入探究，以便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律，我们便可以回过头来阐释个别人物和个别运动的历史中存留的某些尚未澄清的问题。

我们缺少翔实的史料，因而无法详尽无遗地了解那些对于认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许多文献已经散佚不存；而有些文献又仅仅记述了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其内容或则讹悞悖谬，或则语焉不详。而且，许多事件在史籍中未见记载，因为编纂者认为这些事情不值一提；直到后来人们才认识到，当初某件无关宏旨的小事原来正是一起重大事件的胚芽。还有一些情况在史籍中根本无从查考，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情况不言自明，毋庸赘述。可是在今天，这一类情况却使我们感到十分陌生、难于理解了。

即便是最严谨、最精邃的史料考订工作，也只能澄清原始资料中业已充分记述的史实；我们丝毫也不可能通过考订工作去填补历史文献的空白。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遇到这种史料残缺的情况；他必须进行极其审慎的判断，然后再去勉力从事补苴罅漏的工作。然而，历史学家只有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出发，才能站在坚实